

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

阿多尼斯诗选

عزلة حديقة

مختارات من شعر الونيس

[叙利亚] 阿多尼斯 著 薛庆国 选译

③ 译林出版社

عزّلتني حديقة
مختارات من شعر أدونيس

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

阿多尼斯诗选

[叙利亚] 阿多尼斯 著
薛庆国 选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：阿多尼斯诗选 / (叙利亚)
阿多尼斯著；薛庆国译。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
2018.10

ISBN 978-7-5447-7512-0

I.①我… II.①阿… ②薛… III.①诗集—叙利亚
—现代 IV.①I376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3446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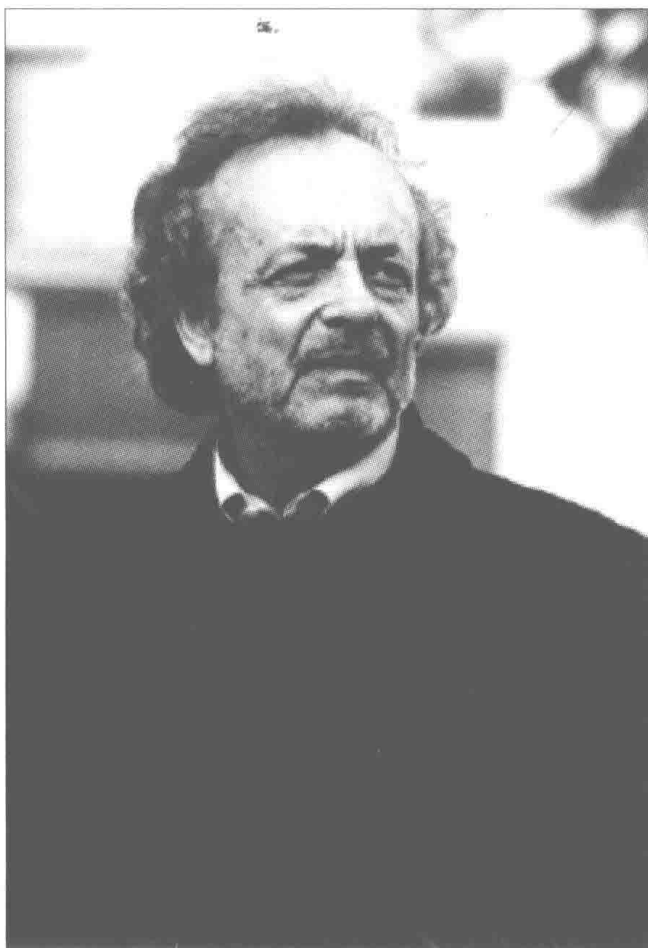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：阿多尼斯诗选 [叙利亚] 阿多尼斯 / 著 薛庆国 / 译

责任编辑 王理行
责任印制 董 虎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插 页 4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512-0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，质量热线：025-836583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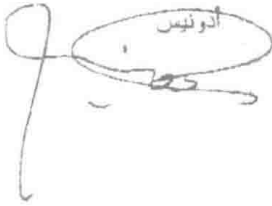


[叙利亚] 阿多尼斯

تفويض

أنا الموقع أدونيس (علي إسبر) أقوض دار بي لين للنشر في الصين بنشر
مختارات من شعري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، شاكراً المترجم والناشر.

باريس في 12 نوفمبر 2008



أدونيس

授权书

本人阿多尼斯（阿里·伊斯伯尔）授权译林出版社在中国
出版我诗歌选集的中文译本，谨向译者及出版社致以谢意。

阿多尼斯

2008年11月12日于巴黎

什么是诗歌精神？

——阿多尼斯诗选中译本序

杨炼

什么是诗歌精神？当我想到这个句子，自己都哑然失笑。在号称后现代的今天，谁敢这样提问呢？对于习惯肢解诗歌器官的学者，这个问题太笼统了。对于热衷以小圈子划分地盘的诗人团伙，这个问题太宽泛了。简单地说，它太“大”了，大得容不下流行的诗歌分类学。这个问题，不是要在一首诗里翻读出一段时间、一种观念、一个流派。恰恰相反，它之提出，正在于真正的诗人对任何分类法发自内心的不信任。或许，发明“诗”——“寺中之言”——这个汉字的人，也已一举造就了我们的命运：像一名巫师，从混沌中发掘万物的关联，又在关联中醒悟真谛。我们知道，确实存在某种贯穿了所有诗歌的东西。每当我们调动生命的全部能量，聚焦于一个句子，就通过写，在贴近它、确认它。我们知道，自己有朝一日也将整个融入它。这是为什么我写得越多、越久，离所谓“当代”越遥远，却感到屈原、杜甫日益亲近；同时，也对是否“中国”愈不在意，因为诗歌比国界、语种深远得多，它的精神血缘，毫无障碍地流注于不同语言之间，构成一个只有诗人能被允许进入的国度。和《离骚》的纵横神话、历史、现实、自我比，和《神曲》的穿透地狱、净界、天堂比，“诗歌精神”一词太

大了吗?或相反,远远不够?对那个潜藏于诗人心底、不停向地平线驱逐我们、同时保持着最高沉默的“剥离了神灵的神秘主义”(阿多尼斯语),我仍在像老子一样“强名之”。这个寒冷的冬日下午,我在伦敦寓所近旁的公园散步,心中沉吟着电话里那个声音:阿多尼斯请我为他的中译诗选写一篇序言。

诗人相遇,总是既偶然又必然。我之认可阿多尼斯是一位朋友,绝非因为他被称为当代阿拉伯语诗歌的代表人物。基于中文的经验,我们已经很了解,所谓“代表”能误会得有多远。和阿多尼斯交往,一言以蔽之,有种精神上的全面满足。两个诗人,跨越地域、年龄、语言、文化,那思想上的充分契合,唯一用得上的形容词是:美。不仅仅是巧合吧,“阿多尼斯”在希腊神话里,恰恰是令维纳斯神魂颠倒的美少年。我和阿多尼斯的第一次见面,是在2003年8月首届约旦国际诗歌节上。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?在“9·11”之后,到死海边那个火药库一样的地点,探访世界上最古老却也最陌生的文化传统之一,让抽紧的神经因为神秘而加倍兴奋!事实也不让人失望:死海上的载沉载浮,“摩西谷”讲述的《圣经》故事,古罗马大理石的废墟,阿拉伯市场的五光十色,沙漠明月下激情迸溅的贝都因民歌……可惜,这类异国情调,对于背后站着中文背景的我,有趣但是不够。我并非仅仅到此旅游而来,正像我不希望外国诗人只把对我作品的理解,停留在文化观光层次上一样。再借用屈原,我想接触当代阿拉伯诗歌的“内美”。特别是,在中东纠缠成死结的现实处境下,一位阿拉伯诗人怎样做到精神上充分独立同时艺术上自觉保持丰富?就是说,拒绝被无论什么原因简单化。这与其说在问别人,不如说干脆就在问我自己。这问题压根就是“中国的”,没有那些中文语境中痛苦的记忆,我也不必寻找它山之石。更进一步,这问题不仅是文学的,更是思想的。它不容忍取巧和回避,而直接检测一位诗人的精神质地。你如果没深思在先,对不起,就没法掩饰头脑中那片触目的空

白!怀着这个隐秘的愿望,我在约旦见到了阿多尼斯。我至今记得,在安曼侯赛因国王中心的诗歌节开幕式上,老诗人端坐于一张阿拉伯地毯(是飞毯吗?),吟诵之声低昂苍凉,缓缓流出。周围上千听众屏息凝神。那张音乐的飞毯,托起所有人,包括我这个此前和阿拉伯文无缘的中国“鬼佬”,上升,平移,逾越黄沙碧海。后来,我了解到,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诵的是一首关于纽约的长诗。

我和阿多尼斯在约旦做的对话《诗歌将拯救我们》^①,堪称当代汉语诗人和当代阿拉伯诗人的首次思想相遇。我说“诗人”,而没说“诗歌”,是因为对我来说,那篇对话不期而然凸显出的,与其说是诗歌状况,不如说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中,独立思想者相似得令人瞩目的处境:我们和自己语言、文化的紧张关系,我们被外部世界简单化的遭遇,更重要的是,我们选择的极为相似的应对立场。这里的“首次”,指的是我们终于摆脱欧美媒体的转手,而第一次由两个诗人面对面、心对心地直接交流,在貌似轻松顽皮的语调中,带出心里深厚的沉积。我无意在此复述整篇对话,但只要稍事梳理话题的线索,读者就不难感到这短短几千字的分量。我们的对话从语言之思开始,阿拉伯语对事物观察的方式,翻译成中文简直就是“意象”和“比兴”。语言不直接谈论现实是因为其实没有“现实”,因此,语言本身即全部隐喻。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独特性,带来各自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,但这复杂常常被外部世界简单化为拥护或打倒,取消诗歌内在的丰富,迫使它沦为宣传。这是另一种诗歌的商品化。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此充满警觉,同时,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觉,包括通过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。具体地说,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号贩卖自己,又坚持自己对现实的明确态度。各种权力体制同样在假文化之名扼杀独立思维,而反抗这种扼杀,使诗与人本质合一。和阿拉伯环境相比,中国诗人面对现实的内心抉择就轻松太多了,但请想象,一个诗人

①《诗歌将拯救我们》:发表于《书城》杂志 2003 年第 10 期。

要有多大勇气,才敢对拥有亿万追随者的宗教神本主义的思想控制说“不”,那声音和黑暗的无边无际相比多么微弱!这样的诗人必定是流亡者,但他的“流亡”一词,被赋予了主动的、积极的含义,那其实是创造性的自我本来的精神定义。也因此,“孤独”成了“独立”的同义词。“距离”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语和文化的能力。生存挑战的急迫,反证出诗歌对存在的意义。它决不只是装饰品,它是每个诗人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,而且,仍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鲜活的能源。归结到底,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。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。诗歌本身就是时间。它终将安顿我们,尽管历尽劫难。

那么,什么是诗歌精神?答案是否已隐含在这里了?那就是:以“诗歌”一词命名的、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。阿多尼斯在《谈诗歌》中开宗明义:“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,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。”这时,他其实是在要求,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作里,读出无数本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书。语言学的,文学的,文化的,历史的,现实的,政治的,天文地理的,甚至爱情和色情的。一句话:整个生活。这种视野,让我直接想到屈原的《天问》:“曰邃古之初,谁传道之?”一句话已把质疑定在了创世纪的起点,而一个“曰”字,又圈定了人在语言中的先天局限。我也想起初次读到叶芝《幻象》时的震撼,它让我懂得:得有一个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,才支撑得起一首诗的寥寥数语!说到底,诗歌就是思想。虽然,那不等于逻辑化的枯燥陈述。我在别处说过,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,她/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,小一点儿都不行。因为我们的历史资源太丰富、文化困境太深刻、现实冲突太激烈,对自我的提问太幽暗曲折,仅仅一个汉字的迷宫就满布陷阱,要想“自觉”,谈何容易!我还没读过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学与文化巨著《稳定与变化》,但,他的主题直逼核心:阿拉伯世界的时间观如何以巨石般的稳定,压倒了变化的可能。这简直就在对中国诗人说话:文革后,我们睁开眼睛时,与其说看见了“时

间的痛苦”，毋宁说根本就是“没有时间的痛苦”。所谓怪圈，究竟有没有“圈”？或干脆原地未动？那么，看起来灯红酒绿的现在呢？这个“有形”背后是何种“无形”？一本本书深处潜藏的“原版”是什么？历史活着、疼痛、困惑、终至肯定，真正的文学，哪有不“宏大”的叙事？

一个问题中的问题：我们还有向自己提问的能力吗？没办法，诗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诗变成《天问》，变成史诗。命定如此，否则什么都不是。

阿多尼斯对我说：“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。”这又心有灵犀了。长，不是为长而长，那是诗意深度对形式的选择。长诗之美，正在他强调的“整体”。犹如群山中有流云、有瀑布、有密林，你能贴近去欣赏每片叶子的美，但没有一个局部能代替整体。长诗要求诗人拥有如下能力：完整地把握经验，提取哲学意识，建构语言空间，最终一切统合于音乐想象力。用阿多尼斯的话：“它的各个层面都是开放的。”就是说，它必是一种语言的观念艺术，且让每个细部充满实验性。一次，我开玩笑说：我们得小心区别“玩意儿”和“镇国之宝”。一位当代阿拉伯或中国的诗人，绝不应仅仅满足当一位首饰匠，靠装配几个漂亮句子取乐。诗歌是有“第一义”的，那就是修炼出纯正灵魂的人，香草美人（阿多尼斯？）之人。听其言，阅其文，如聆仙乐，汨汨灌来。此中精彩，岂是肤浅的雕琢能够胜任的？我们该写值得一写的诗，“配得上”这动荡时代的诗。在我和阿多尼斯之间，哪有“文化的冲突”？离开了冷战的或阿拉伯——西方式的群体对抗模式，我们把公约数定在“个人的美学反抗”上，这被分享的诗意，荡漾在比语言更深的地方。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之间，至少这种全球化是我向往的：诗歌精神的全球化。当一位美国诗人和一位伊拉克诗人一起朗诵，你会发现：他们的作品多么像。同理，让阿多尼斯和我最愉快的，莫过于能从对方的字里行阅读出“我自己”：不安，震荡，追寻，超越。永远出发，却永无抵达。一次次濒临“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

处”^①，把所有旅行都纳入一个内在的旅程，去书写一生那部长诗。

诗歌精神的语法，贯穿在这部大书之内，通透璀璨。它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。

伦敦，2009年1月6日

^① 引自杨炼组诗《大海停止之处》。

“风与光的君王”

——译者序

薛庆国

他的故国是叙利亚，在一个叫做卡萨宾的海滨村庄出生、成长。他拥有黎巴嫩国籍，又常年定居巴黎——他自我放逐的地方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他有多重身份，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：自由。”他还说过：“我真正的祖国，是阿拉伯语。”他的名字是阿里·艾哈迈德·赛义德·伊斯伯尔。阿多尼斯也是他的名字。

阿里——阿多尼斯——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。因为贫穷，他13岁时尚未进入学校读书，但庆幸的是，父亲虽是农民，血液里却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。在父亲的引领下，他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。在学习、背诵古诗之余，他的诗才也逐渐展露。1944年，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前往阿里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，少年阿里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，总统大为赏识，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。阿里入学后苦读法文，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。随后，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，并开始以“阿多尼斯”（希腊神话中的美少

年,叙利亚国王忒伊亚斯之子)为笔名发表诗作。大学毕业后,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,其间因为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。1956年,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:他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,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,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,同埃及并肩作战,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、法、以三国。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,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,却多了一位诗人。

在贝鲁特,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·哈勒,两人意趣相投,共同创办了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《诗歌》,为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。此后,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《立场》的主编,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。作为诗人、学者、思想家的阿多尼斯,对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“政治的边缘、文化的中心”情有独钟,并经申请获得了黎巴嫩国籍。1973年,他以优异成绩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,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的博士论文《稳定与变化》分四卷出版后,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动。20世纪80年代,阿多尼斯旅居巴黎,并任西方多所大学客座教授。80年代以来,他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、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、马其顿金冠诗歌奖、阿联酋苏尔坦·阿维斯诗歌奖、法国的让·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斯·雅各布外国图书奖、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·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。近年来,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。

阿多尼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、思想家、文学理论家、翻译家、画家。除了极为丰富的诗歌创作外,他还著有十余种文学评论与思想理论著作,编选过多部阿拉伯古代与现代诗集,并有十几部译作问世。近年来,阿多尼斯还尝试涉足现代绘画,在巴黎举办过个人画展。他绘制的具有现代风格的抽象画,常被用作自己诗集的封面和插图。

阿多尼斯是阿拉伯诗歌现代化最积极的倡导者,他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见解,为阿拉伯新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在他看来,以新

诗运动为标志的阿拉伯诗歌现代化，关键并不在于形式的革新，而在于内容、语言的革新，在于看待人生、宇宙观念的革新。因此，诗歌体现的不仅是文学与审美的问题，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，是一个“关乎人、存在、人道与文明的问题”。新诗首先应该代表一种新的观念，“其核心是探寻与抗议：对各种可能性作探寻，对主流发出抗议”。新诗不能满足于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抒发感情，而应体现全面、崭新的文化观，表达对人生、社会的全新认识。诗歌也不能满足于像现实主义诗人那样反映现实，而应该启迪读者，如火焰一样为他们照亮新的天际。文学应与政治分开，不应沦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。诗歌是一种最崇高的表达人的方式，应着力探索心灵、爱情、疑问、惊奇和死亡的领地。现代性并不在于时间的新近，而在于是否具有创新、突破的精神。诗歌现代化没有止境，没有界限，而是一个不断变化、求索、超越、反思的历程。要实现诗歌现代化，既应该借鉴西方现代思想与理论，又应该从阿拉伯文化、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。对传统应该重估，尤其应发掘遭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压制、排斥的革新思想的价值。重估传统应回归到对经典文本本身的重读，而不应依赖注释家对文本的注释与解读。

阿多尼斯的诗歌属阳春白雪，知音主要是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；他主张变革、创新的诗学理论虽具有革命性，但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文坛诗界。然而，他对阿拉伯政治、文化、社会作出的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，则对整个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，也使他成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。

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，是阿多尼斯忧伤与悲愤的根源。在他看来，阿拉伯民族有着辉煌过去，丰富的遗产，其人力资源、战略位置、物质财富均得天独厚，历史上也曾有过气度恢宏的开放，致力于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。有了这些良好的条件，当代阿拉伯人完全应该在人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独特的历史性作用，但可悲的是，阿

拉伯的现实与之相反。在阿多尼斯看来：“今天的阿拉伯，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——蒙古人洗劫巴格达，拜占庭的战争，安达卢西亚的沦陷，奥斯曼的殖民，巴勒斯坦的割让——的延续。”为了揭示阿拉伯现实困境的根源，他不畏其艰，深入考察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史。他在巨著《稳定与变化》中指出：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“稳定”，这种稳定近乎“沉睡”，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；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、处于边缘的“变化”因素；以“变化”超越“稳定”，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。他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现实，揭示了阿拉伯文化、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，如：因循守旧思想严重，宗教蒙昧主义肆虐，专制、腐败的政治文化盛行，反省与质疑的意识匮乏……阿多尼斯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，往往思想尖锐，言辞激烈。譬如，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专制统治者，他这样予以痛斥：

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、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，面对外来的野蛮，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，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，实行紧急状态，建立特别法庭，肆意拘捕无辜，剥夺公民办报、建党、结社的自由，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，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腐败、疾病、失业、文盲、饥饿、污染、沙漠化、水荒之中，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，如何能够实现进步，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？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？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，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？

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、抗拒权势、批判时俗、忧国忧民的意识，既和纪伯伦、塔哈·侯赛因、马哈福兹这些阿拉伯文学大师一脉相承，也和全人类的思想、文化精英遥相对接。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

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,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,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、惊世骇俗的效应。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,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,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。

阿多尼斯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发表诗作,其诗集有《最初的诗篇》(1957)、《风中的树叶》(1958)、《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》(1961)、《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》(1965)、《戏剧与镜子》(1968)、《灰与花之间的时间》(1970)、《这是我的名字》(1971)、《复数形式的单数》(1975)、《长诗五首》(1979)、《对应与初始》(1979)、《围困》(1985)、《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》(1987)、《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》(1988)、《第二套字母》(1994)、《书:昨天、空间、现在》(三卷,1995—2002)、《风的作品之目录》(1998)、《身体之初,大海之末》(2003)、《预言吧,盲人!》(2003)、《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》(2007)、《安静,哈姆雷特: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》(2008)、《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》(2008)等。

在诗歌创作中,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。诗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,他毫不讳言地宣称:“我是鬼魅的主人。”“我生活在火与瘟疫之间/在一本传授秘密和堕落的书本里。”“我是个背叛者,我向被诅咒的道路/出卖我的生命,/我是背叛的主宰。”对于传统的价值观,他是一位辛辣的嘲讽者:“什么是通行的道德?/——蜡烛,快要熄灭在令人窒息的洞穴里。”“什么是绝对?/大脑来了月经。”对于世俗的观念,他是一位彻底的颠覆者:“罪过: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。”“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?/那么,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、更美境界的路上。”他以歌唱来抗拒压迫与恐惧:“我由于恐惧而歌唱/我由于被压迫的反抗而歌唱。”他以讥讽表达了对暴君的蔑视:“给老鼠一根皮鞭/它会像暴

君那样趾高气扬 / 老鼠的子宫里挤着一头羊和一只狼。”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,显示着百折不挠的倔强和信念:“世界让我遍体鳞伤, / 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。”他心甘情愿,要做西西弗那样落难者的同道:“我发誓为西西弗分担 / 那块沉默的山岩 / ……我发誓要和西西弗同在。”在诗中,他骄傲地宣告自己的卓尔不群:“今天,我有自己的语言,有我自己的疆域、土地和禀赋。”他也毫不掩饰张扬的个性和大写的自我:“我让自己登基, / 做风的君王。”“一切都在我的眼底,从旅程的第一步起。”

阿多尼斯的叛逆,在某种程度上,固然源自一个生命力、创造力极其旺盛的诗人内心的躁动,但无疑,它更源自诗人对自己所处的国家、民族乃至这个时代境况的失望。在阿拉伯文化中,诗歌一向被视为“阿拉伯人的文献”,意即诗歌是诗人所处时代的忠实反映。在这一意义上,阿多尼斯的诗歌,也可以被视为“当代阿拉伯人的文献”,是了解当代阿拉伯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。诗人阿多尼斯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:“在这个灾难织就、鲜血铸成的时代, / 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, / 它的名字是——祖国。”也为诗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:“诗人啊,你的祖国, / 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。”他还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不幸与落伍而忧戚、悲愤:“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, / 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。”“时光,在阿拉伯社会停止了工作, / 尽管如此,看来只有它还在工作。”他在诗中描绘了一系列阿拉伯城市的颓败景象:“试着去注视 T 城的白昼, / 你发现的只会是黑夜。”“在名叫 Z 城的器皿里, / 生长着叫做‘杀戮’的永不凋谢的植物。”“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否认: / 在 G 城, 二十世纪之后来临的, / 是公元十世纪。”在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诗人眼里,甚至人类社会的 20 世纪也远非一个值得赞美的世纪,而是一个光怪陆离、诡异可怖的时代: